

抗战时期银行界的迁移及其影响

——浙江省个案研究

张根福

内容提要 本文从总体上考察了抗战时期浙江省银行界在抗嘉湖沦陷时期、宁绍战役时期、浙赣战役时期三阶段的迁移情况；论述了银行界迁移对维持和发展银行的基本业务、支持浙江以至全国的抗战事业及推动浙江后方国统区的经济建设所起的作用。

关键词 抗日战争 银行迁移

目前,学术界对抗战时期工业界、教育界的迁移,开始有所关注,但对金融界的迁移尚未展开深入的研究。为此,本文试图就战时金融界迁移的一个侧面——浙江银行界的迁移及其影响作一探讨,以推动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入开展。

抗战前夕浙省银行可分为国家银行、省银行、商业银行及农村地方性金融机构四类。国家银行有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大系统,共设分支机构40处^①;省银行,“除在杭州设置总行外,已先后在湖州、嘉兴、绍兴、宁波、温州、兰溪、海门及上海设立了8个分行,此外还设有办事处、分理处等46处”^②;商业银行有49(家)处^③;农村地方性金融系统,有县银行或

① 陈国强主编:《浙江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第292页。

② 孙庆辰、杜保曾:《旧浙江的银行》,《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46辑,第152页。

③ 陈国强主编:《浙江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第307页。

地方农民银行及其所属办事处 27 处。^①

抗战期间,浙江银行界的迁移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杭嘉湖沦陷时期、宁绍战役时期、浙赣战役时期,它们的迁移对战时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 杭嘉湖沦陷时期的迁移

八一三淞沪会战以后,江浙沪局势日趋紧张。1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战火烧到浙江。不久杭嘉湖地区的一些县城及部分乡镇相继沦陷,浙省银行界与其它社会各界一样,被逼进行迁移。这一时期,银行界迁移的总特点是:国营和省营银行退至浙后方;县级银行随当地政府撤移到农村山区;商业银行其总行在上海者撤回上海,本省举办者大多停业。

1. 中国银行系统

中国银行系统职员,分三路向安全区迁移。一路是响应总行号召,奔赴大西北、大西南,开拓新的金融阵地;第二路,由经理金润泉率领去上海,成立中国银行浙江驻沪办事处,其成员主要是杭州分行和从嘉兴、湖州撤退下来的人员;第三路,由副经理余煜率领,撤至永康,成立中国银行驻永康办事处,简称浙驻永处。^②三路随迁人数约 200 多人,其中杭州分行总部 120 余人,嘉兴支行 30 余人,湖州支行 50 余人。^③

2. 交通银行系统

① 陈国强主编:《浙江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92 页。

② 参见陈国强主编:《浙江金融史》,金融出版社,1993 年版,第 330 页。

③ 据浙档 78-2-46,《近四年浙属员生人数统计表》、《近四年浙属雇佣工人数统计表》中 1937 年人数推算。

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后,嘉兴办事处,即采取紧急处置,除留少数人员外,其余职员于11月8日,各携账册、传票、报表文卷、存单存根及库存现钞,由水路离城,经吴兴、杭州,“移兰溪办公”。^①不久,迁至永康,人员并入杭州分行总部。湖州办事处,因“苏嘉告急,退军云集,形势紧张”,于11月19日停业,撤退菱湖镇。28日,“日军来菱,情势迫急”,复于30日“携件避居草堂村”。12月21日,“撤至兰溪”。分行总部鉴于“湖处账面不多,存户且多避沪”,又“属湖处迁沪”。^②湖州办事处遂于1938年1月1日迁至上海。杭州分行总部于1937年冬,先后分五批撤离杭州,1938年初迁永康城内,“撤永同从共十八人”。^③

3. 中央银行与农民银行系统

抗战初期,中央银行在浙江只有杭州分行和宁波、衢州两个办事处。1937年11月杭州分行总部,先撤退至兰溪,再迁至永康。中国农民银行因成立较晚,1935年才在杭州设置办事处,1936年改为分行。战前除杭州分行总部外,仅有宁波、金华、绍兴等处分支机构。1937年冬,分行总部随省府机关迁至永康

4. 浙江省地方银行系统

嘉湖地区沦陷时,嘉兴、湖州两分行及所属各处、库职员先后撤至杭州,不久随总行于1937年12月18日撤至兰溪,旋迁丽水^④,职员近200人。^⑤总行迁丽水后,为配合政府需要,将永康、丽水、金华办事处扩充为支行。

① 《嘉处报告》,《1937年浙江交通银行因日寇威胁撤退情况报告》,浙档61—3—546。

② 《湖处报告》,《1937年浙江交通银行因日寇威胁撤退情况报告》,浙档61—3—546。

③ 《浙行报告》,《1937年浙江交通银行因日寇威胁撤退情况报告》,浙档61—3—546。

④ 洪品成:《浙江地方银行始末》,《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17页。

⑤ 参见陈左夫口述,蓝周根记录:《我所知道的抗日时在丽水金融机构简况》,《丽水文史资料》第5辑,第181—182页。

5. 商业银行系统

战事发生后,浙省的商业银行大多停业,总部在上海的纷纷迁回上海,职员也随之迁移。据1938年度的调查,中南银行、大陆银行、盐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建业银行、绸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等商业银行的浙省分支机构均迁回上海租界。^①杭嘉湖沦陷后,浙省各地开业的商业银行仅剩8家。^②

至1940年6月,由于杭嘉湖银行的迁移及战时银行的改组。国统区各银行的地域分布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全省共有各类银行21家,大小机构117处,分布在59个县市。^③

二 宁绍战役时期的迁移

1941年4月,日军大举进犯浙东,绍兴、镇海、宁波、慈溪、奉化、余姚、上虞等地先后沦陷,温州、鳌江、海门、玉环、瑞安等地也一度失守,金华、兰溪、永康、丽水等均遭狂炸,这些地区的银行机构和工作人员一部分撤至丽水龙泉。^④少数则迁至上海及江西玉山一带。同年6月,战事暂告平息,撤退银行和职员相继移驻永康或回原地复业。

1. 绍兴行处

1941年4月17日,日军进犯绍兴。绍兴各银行因对形势判

① 参见《各银行战区行处迁沪行址一览表》,浙江地方银行编辑发行:《浙光》第4卷,第3号,1938年6月出版,第12页。

② 陈国强主编:《浙江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页。

③ 参见浙江地方银行总行发行:《浙江经济统计》,1941年12月出版,第156—158页。

④ 参见王恭敏:《抗战时期省金融业在龙泉》,《龙泉文史资料》第3辑,第140页。

断不准,终致应变不及,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农民银行、省地方银行等“悉遭劫掠”。^① 银行职员大多被困城中,后陆续逃脱,如中国银行职员先后迁至永康、龙泉、缙云等地,在内地复业^②,地方银行职员则“绕道去嵊县集中,随同银行后撤到永康、云和直至本省边境的龙泉县”。^③ 也有不少职员避往乡间。后日军为获取更多的库存,开始捕捉银行职员。为免遭迫害,部分职员迁往上海,如中国银行经理倪永芳、交通银行经理张仲和都撤至上海。据《绍行撤沪各员生职务支配表》,相继撤至上海并重新安排工作的交通银行职员即有15人。^④

2. 宁波行处

1941年宁波沦陷前后,在甬银行“有的内迁,有的归并上海总行,有的停业”。^⑤ 宁波实业银行宁波分行在同年4月迁至上海,11月裁撤;浙东商业银行、中国垦业银行宁波分行及叙商业银行宁波分行等,沦陷前停业。中、中、交、农四大国家银行的宁波支行或办事处及省银行宁波分行则撤迁到永康、龙泉一带,也有部分职员撤至上海。譬如,中国银行宁波支行及鄞县办事处,得知日军在镇海登陆后,即在会计主任吴廷瑜和出纳主任黄义本的率领下,“携带库存180余万元,账册30余箱”^⑥,经嵊县、永康等地撤至龙泉,撤退人员共37人。^⑦ 又如,交通银行宁波支行于沦陷前停止

① 李身铿、陈又新:《绍兴沦陷前后各公营银行》,绍兴市政协文史委编:《抗战八年在绍兴》,第50页。

② 《绍兴市志》,第2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4页。

③ 裘振康:《旧绍兴的银行》,《绍兴文史资料》第2辑,第124页。

④ 《绍行撤沪各员生职务支配表》,1941年7月23日,浙档80-2-134。

⑤ 《宁波市志》(中),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604页。

⑥ 《陈报宁波沦陷撤及鄞处撤退龙泉由》,(1941年5月8日),浙档78-2-118。

⑦ 《甬鄞随同撤退员生名单》、《甬鄞随同撤退工役名单》,浙档78-2-118。

办公,派员押送账册及重要图章、印鉴至南乡石契,经永康迁至龙泉。^①部分职员在迁移途中遇敌,转至上海。

3. 温州、鳌江行处

战役期间,日军一度在温州、鳌江等地登陆,此地部分行处也进行了迁移。如中国银行温州支行,闻悉4月19日日军在瑞安登陆,即作撤退准备,将“携走之公事箱件,车送城外大士门集中”,“舟行四日,抵达丽水”。^②平阳的鳌江办事处也于19日夜,率员“携带库存、重要账册,从容随机关及中、农、地行退西桥”。20日凌晨退往塘川。22日晨,“又退山越岭,经六十里到达北港水头街”。^③

4. 永康、金华行处

4月19日,永康城区惨遭日机狂炸,死伤甚重,“小型商市尽毁,四行周围均着弹起火……居民迁避一空,全城已成死市”。遵省府意旨,原撤驻永康的中、中、交、农四行的杭州分行及其职员,为安全计“携带要件撤退龙泉”。^④4月15日,金华市区也遭日机轰炸,交通银行金华支行“四周房屋均中弹”,“所租横街仓屋全毁”。不得已于4月25日“偕华中行(中国银行金华办事处)暂撤(江西)玉山”^⑤;并将库存28万元暂寄中国银行玉山办事处。

1941年6月,战局暂告平息,中、中、交、农四行之杭州分行又回永康复业,“其余撤龙的银行机构也先后回原地复业,或随其分

① 《宁波沦陷甬行撤退经过及同人履历艰险情形报告书》,浙档80—2—134。

② 温支行:《为陈敝处撤退情形事》,(1941年4月30日),浙档78—2—118。

③ 《为陈报姚鳌两处撤退经过请鉴察由》(1941年5月21日),浙档78—2—118。

④ 交通银行浙行:《陈报浙东事变后浙永处暨华兰瓯绍各行处撤退经过大略及现状》(1941年5月),浙档80—2—134。

⑤ 交通银行浙行:《陈报浙东事变后浙永处暨华兰瓯绍各行处撤退经过大略及现状》(1941年5月),浙档80—2—134。

行移至永康”。^①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上海租界。原先一些迁往租界避难的银行及其职员,被日方劫持到沦陷区开业,有的则重新迁到浙江山区后方。中国银行“浙驻沪处”被日军劫持,改组后仍回杭州、嘉兴等地复业,原来湖州部分业务并入杭州。其部分职员被强令回浙。这样,浙江境内在一段时间里就有两个互不相关的“中国银行”,“一个是属于国民党政府在后方山区的中国银行;一个是属于敌伪政府沦陷区的中国银行”。^②交通银行在租界沦陷后,也曾多次遣行属同人赴浙江永康服务。1942年初就组织40名职员,“化整为零,由各人自行结合,伙伴同行”,“自择便利径赴永报到”。^③

三 浙赣战役时期的迁移

1942年5月,日军为了封锁浙闽沿海地区和浙赣路,破坏衢县、丽水、玉山等机场,以消除其对日本本土的威胁,发动了浙赣战役。这次战役历时三个多月,日军铁蹄几乎遍及整个浙东,浙西、浙南一些地方也相继沦陷,战区一些银行与工作人员被迫再次迁移。这次迁移大略可分为三个阶段:

1. 撤迁龙泉

战事发生后,浙省政府和第三战区司令部制定了《金兰衢永一带物资疏散办法》,密令“金兰衢永一带物资,应向浙赣路以南缙

① 王恭敏:《抗战时期省金融业在龙泉》,《龙泉文史资料》,第3辑,第140页。

② 陈国强主编:《浙江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第324—325页。

③ 《报告由上海经杭州来永康穿越敌军封锁线经过情形,及沿途行李叠遭劫夺没收损失不贻,请求救济事》,浙档80—4—4。

云、松阳、龙泉、遂昌、宣平、浦城、广丰、铅山、崇安等地疏散”，并决定，“将永康各银行移龙泉，金兰衢三地各银行移江山，永金兰衢四地恢复联合办事处制度”。^①中、中、交、农各行接令后制定出一些疏散的且体办法，规定“将下列各项以最迅捷方法陆续后移：(1)大宗现钞；(2)储蓄卷；(3)重要账表；(4)重要文卷；(5)处理内部工作之行员；(6)一部分警役；(7)行员眷属；(8)必要之器材公物”。^②部分银行还安排了疏散的步骤。

1942年5月，驻永康的中、中、交、农各行处陆续迁至龙泉。金衢地区各行处按原计划撤至江山，但“嗣以战事演变，江山不能满足，辗转再退龙泉”。^③原迁驻丽水的浙江地方银行总行也撤至龙泉，其所属行处“均相后撤，暂驻云和、景宁、龙泉、庆元一带办公”。^④

2. 撤迁庆元、瑞安及闽、赣、桂等地

1942年5月下旬，赣北告急，浙赣交通受阻。6月下旬，丽水失守，龙泉也开始吃紧。此时，已撤至龙泉的中、中、交、农各行处及浙江地方银行各行处不得不再次迁移。一部分撤向庆元，一部分则退往省外各地。同年7月，永嘉、乐清、瑞安、平阳各县相继沦陷，其所属各行处撤至瑞安区的高楼。譬如，中国银行，驻龙泉各行处陆续撤至庆元的有27人^⑤，后撤闽省者的有49人。^⑥其余则在经理金润泉的率领下，辗转于福建浦城、建阳、永安和江西赣州

① 《金兰衢永一带物资疏散办法》(1942年5月)，浙档77-1-7。

② 《四行遵令办理疏散办法》(1942年5月)，浙档77-1-7。

③ 《函陈浙及属本年撤移经过开送得力人员名单请赐核奖由》，浙档78-2-122。

④ 《浙江地方银行概述》，浙江地方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浙江经济》第1卷第1期，1946年7月出版，第16页。

⑤ 参见《浙江由龙泉撤移庆元人物一览表》，浙档78-2-122。

⑥ 《伪中国银行三十一年五月后浙属行处应变措置及撤移案》，78-2-120。

等地,行程达几千里。^①同年7月,日军循青田水道进犯温州,敌海军也相继在温州、鳌江各地登陆,温州支行鳌江办事处,“于7日晚由鳌撤平阳江南宜山,10日晚续撤南港灵溪;15日晨再撤至北港水头街,16日越山岭60里步行至高楼”。^②又如交通银行,战役期间,浙属各行处主要迁至庆元、永安和桂林三处。撤至庆元的职员共有6人,携带“密本图章、印鉴、存根、各户余额表、简单文卷及库存179万元”,撤至永安的“计有浙行属全部正账、旧表册及职员39人”,撤至桂林的职员共16人,随迁“计有浙行属全部副账、副印鉴、保管员、重要文卷等”。^③这一阶段中央银行、农民银行及浙江地方银行各行处主要迁庆元办公。

3. 迁回龙泉等地

浙赣铁路被打通后,日本大本营认为“作战目的”已达到,命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浙江作战结束后要确保金华附近重要地区,返回时日应在8月中旬末尾。”^④各路参战日军从1942年8月15日开始相继退出温州、丽水、江山、衢州等地。中国军队乘势进行反攻,收得一些失地。

同年10月,中、中、交、农四行杭州分行均迁回龙泉,“所属行处能回原地复业的,都回原地复业;不能回原地的,一部分另驻他地营业,一部分暂予撤并”。^⑤浙江地方银行总行也撤至龙泉办公,其“各属行处以及淳安、遂安、寿昌、于潜、昌化、临安、天目山、

① 吴瑞章、谈建军:《金润泉与杭州中国银行》,《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46辑,第95页,金润泉1939年回浙江,主持浙江中国银行工作。

② 《伪中国银行三十一年五月后浙属行处应变措置及撤移案》,浙档78-2-121。

③ 《浙行属撤移各地后布置情形报告书》(1942年8月21日),浙档80-2-707。

④ 参见冯宇《抗日战争时期浙江的正面战场》,《浙江学刊》,1994年6月。

⑤ 王恭敏:《抗战时期省金融业在龙泉》,《龙泉文史资料》第3辑,第141页。

孝丰、安吉、江山、常山、开化等行处，均即遄返照常营业”。^①

自 1942 年 10 月至抗战结束后，中、中、交、农四行杭州分行及“四行联合办事处浙江分处”、浙江地方银行总行就一直驻在龙泉。1942 年冬，国家邮政储金汇业局在龙泉成立浙江分局；中央信托局则在驻龙泉的中央银行杭州分行内附设代理处。1943 年 2 月，浙江地方银行把龙泉办事处扩组为分行，并在龙泉小梅镇成立了分理处。原驻丽水的浙江省合作金库也于这一时期迁至龙泉营业。这些银行的营业场所都设在县城，中央银行还设有库房和无线电台。当时，集中在龙泉的银行工作人员不下四五百人，加之家属，总人数在千人以上。^②

1944 年春以后，日军为了挽回其太平洋战场中的不利局面，决心打通中国东北至越南的大陆交通线，故发动了大规模的豫湘桂战役。为配合这次军事行动，驻浙东的日军在浙赣路东段沿线对中国军队进行了牵制作战（又称第二次浙赣战役）。同年 6 月日军相继占领了汤溪、龙游、衢州等地。但因孤军深入，补给困难，至月底便退出。8 月下旬日军进攻永康东南的桐琴、黄碧、并经缙云，占领丽水。然后分兵于 9 月初侵占温州、乐清等地。丽水之敌不久被中国军队击退，温州之敌则于次年 6 月才撤走。

在这次战役中，受战事威胁，部分银行及职员进行了迁移。如当时移驻江山的交通银行兰溪支行和中国银行兰溪支行，一度迁至福建浦城。^③又如，8 月下旬，丽水吃紧后，暂驻丽水的交通银行

① 《浙江地方银行概述》，浙江地方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浙江经济》第 1 卷，第 1 期，1936 年 7 月版，第 16 页。

② 王恭敏：《抗战时期省金融业在龙泉》，《龙泉文史资料》第 3 辑，第 142 页。

③ 交通银行兰溪支行：《陈报日寇自金华出掠，连陷汤溪、龙游、进迫衢县、江山兰处撤退浦城经过及布置详情祈钧洽转陈备案由》，浙档 80—2—645。

温州支行和中国银行温州支行分批迁至瑞安高楼。^①这一时期，银行界的迁移只是局部性的，迁至龙泉的中、中、交、农各行处及浙江地方银行各行处都没有撤移。

四 银行迁移的影响

浙省银行界的迁移，对金融业本身及当时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维持和发展了银行的基本业务。

银行及其职员在迁移过程中，将重要库存、账册、誉宗、材料等都随同迁移。如交通银行杭州分行在离杭时，先将总行寄存此行的大宗钞券、公债等陆续出运，“并将本行库存钞券、重要文件、账册及应用物件分四批经兰溪运抵永康”。^②中国银行杭州分行及其下属各行处在浙赣战事期间，“各同人在戎马倥偬之际，策画应付，冒险抢运公物、重要库存、账册等件，均无遗失”。^③其它各行处也是如此，一些银行还派人在龙泉建立副账组，负责保藏和登记副本账，以防正账册被毁。中央银行在龙泉建立金库，浙赣战役后大部分现钞存放于此。^④这样，使战时浙省金融业务得以继续进行。

尽管各家银行历经周折，辗转各地，便在内迁职员的努力下，

① 交通银行温州支行：《为陈报撤退高楼经过情形由》，浙档 80—2—654；《伪中国银行三十三年撤移案》下，浙档 78—2—117。

② 参见《浙行报告》，《1937年浙江交通银行因日寇威胁撤退情况报告》，浙档 61—3—546。

③ 《函陈浙及属本年撤移经过开送得力人员名单请赐核奖由》，《中国银行三十一年五月后浙属行处应变措置及撤移案》（三），浙档 78—2—122。

④ 参见王恭敏：《抗战时期省金融业在龙泉》，《龙泉文史资料》第3期，第140、142页。

其基本业务如存款、放款及投资、汇款等并没有停顿下来,相反一些银行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如浙江省地方银行迁移前的1937年存款为2748万元,放款及投资2548万元,汇款8700万元。到1940年,分别增至6900万元、5770万元和33000万元,比迁移前各增加了4152万元、3222万元和24300万元。

迁移前后浙江省地方银行营业状况比较表(单位:万元)

年份	各项存款	放款及投资	汇出汇款	纯利
1937(迁前)	2748	2548	8700	45.4
1938(迁后)	3550	2559	8299	43.4
1939(迁后)	4887	3411	17488	84.1
1940(迁后)	6900	5770	33000	不详

(资料来源:据朱林:《浙江地方银行概况》提供的数字整理,载邮政储金汇业局发行《金融知识》第1卷第6期,1942年11月出版)

浙赣战役以后至抗战结束,中、中、交、农四行之杭州分行和浙江省地方银行总行就一直驻在龙泉,这时省政府也迁至云和一带,军政机关存汇业务不断扩大。龙泉这一战前金融极其落后的偏僻山城,“竟成为当时浙江的金融中心”。^①

其次,支持了浙江以至全国的抗战事业。

迁移后的银行界对抗战事业的支持是多方面的:一是协助国民政府和地方政府抢购军用、民用物资。抗战初期,中国的主要工业城市和重要通商口岸如天津、青岛、厦门、广州等先后沦于敌手,致使西南等大后方工业品的供应严重不足,浙江的宁波、温州等港口就成为向上海抢购工业品的重要口岸。南迁的中、中、交、农四行都积极的支持国民政府的贸易机构进行抢购物资和运销活动。

① 王恭敏:《抗战时期省金融业在龙泉》,《龙泉文史资料》第3辑,第139页。

因此,由大后方汇至浙省采购物资的款项数量十分庞大,汇兑业务成为内迁银行的主要业务。浙江地方银行对抢购物资也予以积极的配合。如,“(国民)二十九年浙省棉花之收购,由该行统筹”,其它如由海宁、海盐、嘉兴、杭州等处购进之干茧、土丝、羊皮等“数值皆颇可观”。^①该行还专门成立了货物运销处,后改名为大成庄,“以抢购邻近游击地区的各项物资为主,亦就地采购,如交通器材、工业原料、化工原料、农业产品(如丝茧、肥田粉)以及布匹,各种日用品等,各类繁多,数量亦大”。^②大成庄总庄原设丽水,后迁龙泉,兰溪、窄溪等地设有分庄,其它一些地方设有代库机构。它们除抢购物资外,同时承担着收兑金银、办理信用业务、搜集敌伪经济情报的任务。二是抵制日伪经济侵略,稳定浙江后方的金融。杭嘉湖沦陷后,大量人口迁向钱塘江以南,使后方国统区“货币流通,顿失常态”。^③加之日伪在占领区到处搜刮民间铜器和铜镍辅币,造成浙省各地(包括国统区)铜镍辅币严重不足,“有些地方用邮票、火柴票代替分币找零;有的用竹签代分币;有的则发行代用券”。^④致使市场流通严重受阻。为方便民众的交换与流通,同进抵制日伪的经济侵略,迁至浙南的省地方银行,从1938年开始,发行小额钞票和辅币。1938年2月至1940年5月,共发行1217万元,1940年7月—1941年5月,发行2200万元。^⑤使后方国统区的辅币流通得以周转,杜绝了乱发代用券的流弊,对当时后方金融

① 朱林:《浙江地方银行概况》,邮政储金汇业局发行:《金融知识》第1卷第6期,1942年12月出版,第137页。

② 洪品成:《浙江地方银行始末》,《浙江文史资料称辑》,辑9辑,第20页。

③ 沈松林:《浙江战时经济史料》,浙江地方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浙江经济》第1卷第2期,1946年8月出版,第21页。

④ 陈国强主编《浙江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第336页。

⑤ 前揭陈国强:《浙江金融史》,第337—338页。

的安定作出了贡献。三是开展节约建国储蓄,为抗日蓄备资金。为吸收社会游资,合理运用于抗日事业,各银行还多次举办了节约建国储蓄,为抗日蓄备资金。为吸收社会游资,合理运用于抗日事业。各银行还多次举办了节约建国储蓄,如浙江省地方银行于1939年6月开始奉命办理,“初期以民众不明了其意义,储数不大,到三十年代,每期纪录均能超过预定数,并且在二十九年,地方银行接受本省邮政管理局的委托,在省内各地代理销售节约储金券,销数很畅”。^①此外,银行界的迁移对协助地方财政,推动浙省合作事业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切都有力地支持了浙江以至全国的抗日事业。

第三,推动了浙江后方国统区的经济建设。

银行及其职员迁至浙南以后,对当地的工农业生产予以积极的支持和扶植。中国、农民、浙江地方等银行和省、县合作金库,把农贷当作重要工作。如浙江省地方银行,1938年秋,在丽水将原有的农贷机构加以扩充与调整,设立东、南、西三乡农村贷款所三所,直接办理农产储押贷款、青苗质押贷款及联合运销事宜。是年冬,遵部令,又在银行所有分支行处所在地筹设农村贷款所。1939年,办理农贷方面的业务,“总额达三百万元”。^②1940年后,又增加了供销贷款、农村小工业贷款、农业推广贷款、农村小水利贷款等项,并“使农民与农业团体机关均有请借机会”。^③这对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补益非浅。在工业生产方面,浙江地方银行也予以

① 沈松林:《浙江战时经济史料》,浙江地方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浙江经济》第1卷第2期,1946年8月出版,第21页。

② 朱林:《浙江地方银行概况》,邮政储金汇业局发行:《金融知识》第1卷第6期,1942年12月出版,第136页。

③ 沈松林:《浙江战时经济史料》,浙江地方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浙江经济》第1卷第2期,1946年8月出版,第21页。

积极的推动。它一方面直接投资,在丽水、龙泉、温州等地兴办了十多家企业,如浙江制革厂、浙江印刷厂、信大印刷厂、浙光工场、正大棉织厂、大方棉织厂、源大丝厂、建业造纸厂、鼎大制茶厂、大中花社、信业纸号等;另一方面,对工矿业进行贷款支持,予以资金融通,如1945年,其工矿业放款资金达203484900元,占全部放款总额43792532681元的46.47%。^①其它方面,如“交通、渔业、地政等均多少受到金融机关的协助而维持或发展”^②,浙江后方国统区一些原先十分落后的区域也由此得到初步的开发。

(作者张根福,1964年生,浙江师范大学政法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刘兵)

① 洪品成:《浙江地方银行始末》,《浙江文史资料》第9辑,第23页。

② 沈松林:《浙江战时经济史料》,浙江地方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浙江经济》第1卷第2期,1946年8月出版,第21页。